

日本「國語」的近代^{1*}

安田敏朗著^{*}

呂美親譯^{**}

摘要

本論文嘗試以統治技術的觀點來討論近代民族國家中的「國語」。正因作為一種技術，則其體系也必須加以整頓；在整頓工程中近代性等特質表現於其中，而國語國字問題也成為此工程的一環。另外，為與其他國家體系加以區別，「國民性」等精神性與歷史性的重要特質，也被置入國語這個體系當中；近代的「國語」即在此兩種建構成就之後才隨之誕生。這個作為統治技術的語言，亦如在言文一致運動裡所呈現的，其被視為一種國民全體任誰皆能閱讀且書寫的新文體；而生活於同一時代的同一國家之國民，就言說著同一種「國語」。這個被統一的「國語」，也往往被稱作「標準語」；且因是統治

^{1*} 譯注：日本史上的「近代」，一般指明治維新以後、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時代；而「現代」則多指戰後（太平洋戰爭戰敗之後）的時代。雖日語的「近代」與中文的「現代」（modern）意涵相近，但時代指涉有所差異，因此譯題仍保留原來的「近代」用法。又，文中引用之書名或文章名，依當時用字而以繁體字呈現，必要時附上括號漢譯；而現當代之參考文獻，則保留現行日語用字，而不改換繁體漢字。

^{*} 作者係日本社會語言學學者，現任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副教授。

^{**} 譯者現為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生。

技術，言說國語也被強制性地加以要求。本論文即是將近代日本中的國語之建構過程加以闡述出來。

關鍵詞：森有禮、上田萬年、作為制度的國語、國語的自然化、標準語與方言、國語與殖民統治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Language” in Modern Japan

Yasuda Toshiaki

Translated by Li Bichhi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will explore how national language (國語) in the modern nation-state was utilized as a techniques of state authority. Because it is a techniques, it is necessary for it to be maintained as a system — this is where its modernity is represented and where it is linked to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Scrip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ystem incorporates the spiritual and historical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national identity” (國民性) and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nations. When these two constructions come into being we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The language to shoulder this techniques of state authority was regarded as a written style such as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genbun itti (言文一致 unification of speech and writing)” which enabled all subjects (國民) to read and write. It is the same “national language” spoken by the same national subjects living in the same historical period. This same “national language” is frequently labeled “standard language,” and comes under increasingly coercive demands to

be used as techniques of state authority. In this paper I will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in the modern Japan.

Keywords: Mori Arinori, Ueda Kazutoshi, national language as a system, naturaliz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standard language and dialects, national language and colonial rule

日本「國語」的近代

安田敏朗 著

呂美親 譯

一、前言

明治初期的知識分子西周（1829-1897），於其編譯的《百學連環》（1870）中，將“language”譯作「國語」，「國語」一詞自始登場。此「國語」，非指“Japanese language”，以現今而言僅是「語言」之意；歷經130年，於今其被賦予如下意義。

日本文部科學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或文化廳長的諮詢機關——「文化審議會」，於2004年2月提出的意見書《これからの時代に求められる国語力について》（《關於能夠因應未來時代的國語能力》¹）之中，如此定義國語：

國語，乃形塑於悠久歷史中而成國家文化之基盤，亦可謂為文化。國語中每一辭彙都凝聚了使用它的吾等先人之悲、痛、喜等情感與感動。為理解、傳承並創造、發展吾等先人所建構出的傳統文化，國語不可或缺。²

¹ 原文請參考文化審議會：《これからの時代に求められる国語力について》，文部科學省，網址：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bunka/toushin/04020301.htm，檢索日期：2012年10月25日。

² 參見文化審議會：《社會全體にとっての國語》（《對全體社會而言的國語》），文部科學省，網址：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bunka/

國語，為「國家之文化」的基盤，即其中凝聚了「先人」的所思所想。而關於國語教育，此報告亦如是論：

又，近年所見日本社會中之人心荒蕪等事，此問題之一大原因乃源於，缺乏理解身為一個人所應有的感性及情緒的能力，即感知力的闕如。所謂感知力，即例如感知他人苦痛如自身苦痛之心；美的感知、感觸、眷戀、家族愛、鄉土愛，以及愛著日本的文化、傳統與自然之祖國愛，乃至謂為名譽或恥感之具社會及文化意義的價值之感情、情緒等，都能以切身來感知的理解力。

此能力非與生俱來，主要是透過國語教育領悟得來。國語教育之大目標在於，確實養成如此的感知力，並以此培育正確的教養或大格局之觀感。³

國語，乃人格養成之基礎，且包含著感知家族愛或祖國愛的基礎、文化及傳統，因此國語教育不得忽視；而此亦可謂國語萬能觀。此文書乃答詢報告，想當然爾對文部科學省的政策有所影響。2006年修訂的教育基本法中，可見到第2條列入了「尊重傳統與文化、愛惜其育成之我國家與鄉土」，作為教育目標，想必與此報告不無關係。

本論文將概略追溯原僅意指「語言」的「國語」，在經過怎樣的歷史演變而被賦予新的意義。關於自幕府末期至明治20年代（約1887）之間，有關國語（language）被賦予國家的國語、國民的語言等課題，已有縝密的先行研究。⁴ 而本論文將從作為國家統治技術的

toushin/04020301/002.htm，檢索日期：2012年10月25日。

³ 參見文化審議會：〈國語力の向上を目指す理由〉（〈提升國語能力之理由〉），文部科學省，網址：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bunka/toushin/04020301/003.htm，檢索日期：2012年10月25日。

⁴ 參考鈴木泰等編：《國語意識の発生——国語史2》，《古田東朔近現代日本語生成史コレクション》（東京：くろしお出版，2011年），第2卷；又，かめいたかし：〈「こくご」とはいかなることばなりや——ささやか

語言這個概念出發，並聚焦於對國家或國民而言，國語如何變成是「自然」（理所當然）這一面向進行討論；另也論及彼此制度排除在外的物事等問題。

二、作為制度的國語

（一）制度的必要性

無論任何時代或所在，都有很多以文書報告來運轉國家制度的事例。因此，要以文書形式來運轉國家制度，則齊備的書面語較被採用亦為理所當然；由此亦能理解為何習得此書面語，即擁有趨近國家制度中樞的重要條件之事了。而正因掌握書面語即能獲得特權，所以也就沒必要使得構成國家的每個人都以同一語言書寫或言說。

然而，進入近代之後，情況有所改變。如何制定近代指標，乃一大難題；此亦可謂將國家成員中的每個人一元化並大規模加以收編的一大工程。準此，引進收編工程之相關技術或制度，即為近代化。

就語言問題而言，讓被收編成國家成員中的每個人言說、書寫同一種語言的工程，於近代脈絡中是必要的。媒體或法律、軍隊等將人們大規模收編起來的技術或制度中，書面語乃不可或缺之物；若不讓國家成員中的每個人都理解書面語，則要他們都持有一致的國民意識是不太可能的。亦即，語言被視為一種統治技術來加以應用。這樣的討論應無需搬出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來解釋，就能簡單理解；倒是，要讓哪種語言成為那「同一種語言」，則依每個國家或地域的歷史狀況不同而產生相異情形。

這作為統治技術的語言、被制度化的語言之意涵，則含攝於近代的「國語」這個語意裡。

なる つゆばらいの ころを こめて》，《国語と国文学》第47卷第10號（1970年10月），作者將國語學視為學術問題，並詳細分析其意義變化。

若國語是種制度，則齊備完善的制度，且擬定並實行相關推廣政策（語言政策），即是把國家視為一個主體而加以執行的事。而當此政策以國家制度的手法來普及全國時，勢必也將改變舊有制度，因此也可能發生強行排除原有制度的狀況，方言問題即與此相關（殖民地統治問題與此相似）。

以近代化為目標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即在此工程中創造出國民。為能有效率地營運國家制度，並且提高人口的流動性，當然需要盡可能單一且均質的語言；而這也是作為制度的國語之特徵。成為統治技術的國語，因為變成一種技術，於是也失去其在人類生活中原有的（能否如此斷言，仍待商議）「自然」樣貌。即便如此，這個語言也獲得了對民族國家而言之新的「自然」意義（此點容後再述），然後被視為政策性的、極具人工特質的創造物。

國語，被認為是均質的存在，且是可讓該國民平等地被教育以及被言說之物。它也因為成為國語，而被認為是文明的、進步的，於是也變成對未成為國語的方言或相異語言施加壓力的依據。

（二）適合作為制度的語言——森有禮的英語採用論

明治初期，因無法確實以日語施行教育，或日語猶未能有知性的思想及表現，而出現了使用英語的意見。當時代的馬場辰猪（1850-1888，自由民權運動者）感嘆說，這樣的議論，不僅在外國人，日本人之間也討論得相當熱烈；⁵而馬場則直接接受了森有禮（1847-1889）⁶的主張。1872年，任職駐美代理公使的森有禮，在寄給

⁵ Tatsu Baba, *An Elementary Grammar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London: TRÜBNER AND CO., 57 & 59 LUDGATE HILL, 1873).

⁶ 森有禮出身於薩摩藩（今鹿兒島）之武士家族。為明治時期的政治人物，參與重要的外交及教育等政策。1865年赴英美留學，期間接觸基督教；回國後參加明治初期知識團體「明六社」（「東京學士會院」前身）的創立；而後亦擔任東京學士會院首任會長。1885年擔任伊藤博文內閣的首任文部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森有禮被認為是激進的歐化主義者，於

美國語言學者 W. D. Whitney (1827-1894) 的書簡及其著作《日本の教育》(《*Education in Japan*》) 序論中，就有使用英語的主張。⁷他認為日語中的書面語及口語之間有所乖離，且斷言未藉助漢文的日語(以“Japanese language”或“language of Japan”記之)，即便爲了日常溝通目的，也未曾以之應用於教學等使用，此意味著日語有其貧瘠所在。而就書面語及口語間的乖離狀況，森有禮主張採用已簡易化的英語來解決日語的貧瘠問題。

長谷川精一在最新且極具綜觀性的森有禮研究之著作中，討論了英語採用論以及批判此說的相關論述(幾乎可謂「暴論」——粗糙的言論)。他認為，因「英語的採用，即在形塑日本這個共同體之形象」，且爲了「實現使日本成爲可與歐美列強相抗衡的國家之目的」，在當時乃必要而有效的方法。⁸而對於作爲制度的國語之必要性，最能感同身受的，應屬森有禮了。

森有禮這樣的說法，也並非沒有以英語追求近代化的面向，但對他而言，重點在於，若爲讓全體國民能閱讀言說「同一種語言」，則最適當者即爲簡易的英語。

馬場辰猪爲了反駁森有禮所言的日語貧瘠論，亦提起自己留學倫敦時，曾以英文撰寫日語初級文法一事。時過境遷，在1943年的一篇介紹森與馬場的論戰文章中，則有如下評論：

於是，馬場辰猪首先反駁森有禮所謂日語需藉助支那語才能成立，因此較劣等的論點，並再指出日語的優劣和英語相當，且兩者各有長短。其雖未大膽斷言國語較英語優越，但他將兩者地位視爲齊一這點，在歐化主義當道之時，可謂極其稀有的愛

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當日被刺殺身亡。

⁷ 原文收錄於大久保利謙編：《森有禮全集》(東京：宣文堂，1972年)，第3卷。

⁸ 長谷川精一：《森有禮における国民的主体の創出》(京都：思文閣，2007年)，頁250-251。

國卓見。……尤其他指出，國語乃是將全體國民合而為一並加以統一成為一個國家的原動力；此如同他強調僅以國語進行國語教育而能達成目標一事，堪稱一代高見。⁹

事實上，二次大戰中高漲的民族主義，也必須納入考量。若僅以馬場為愛國主義者，而森為歐化主義者這樣單純的二分法來衡量，而未參酌明治初期的語言狀況，當然會出現片面讚揚馬場的情形；即便森也是為了「將全體國民合而為一並加以統一」，而主張採用簡易英語。由此可知，於明治初期，首先人們認為必須有個「將全體國民合而為一並加以統一」的語言存在；而森有禮認為日語還未能成為這樣的語言。當然，森也是個優秀的愛國志士。據長谷川精一所言，森有禮是「明治期間，為了對於創造等質的國民而必須進行國家介入一事，最早且最為徹底關注並實踐的獨特之人」。¹⁰ 所以，其英語採用論亦能由此脈絡來理解。

不過，民族主義具有在世界各地都能生成的共通性質，即便其被作為工具而興起的背景無太大相異，但它同時也必須與其他主義之間有嚴密區隔。在思考民族主義的這種具普遍性與個別性的雙重結構時，森有禮將制度的效率置於第一考量，而未能周到地考慮到個別性的問題。總之，雖然森是極有自覺地將語言視為統治技術，但對民族國家日本而言，英語是否可謂「自然」之物的觀點，他並不重視。亦即，僅以英語的簡易化來考量，則差異化的問題則被忽略了。

從這篇1943年的文章來看，國語一方面被認為可有效率地擔負近代式的制度，如森有禮這個典型論述；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擔負民族問題的意義，正如森有禮後來被批判，也是出於民族問題被加以強調的關係。

⁹ 稻富榮次郎：〈明治初期の國語廢止論（上）〉，《國語文化》第3卷第7號（1943年7月），頁20。

¹⁰ 長谷川精一：《森有禮における國民的主体の創出》，頁20。

(三) 制度的內涵

1. 標記與文體的問題

要讓全體國民以「同一語言」閱讀、書寫與言說，首先得要縮小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乖離；但這並非一項簡單工程。關於此點，作家井上ひさし（1934-2010）¹¹的小說《國語元年》¹²裡亦有所描繪。小說中敘述著於明治初期被命令制定「全國統一之口語」的文部省官員們，被多種口語（方言）與圍繞其間之政治（以及家庭中的）力學所擺佈，結果發瘋的故事。而正如故事最後所揭示的，要在短時間內以人爲力量完成此工程，乃極其困難之事。

要將書面語及口語等全都改成「同一語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理念上是可追求的。而過程中，也會產生制度化的難易度與學習的簡易性（大眾性）之間的平衡問題。

明治初期以來，平假名專用論、羅馬字專用論等文字系統的標記論盛極一時。這些論述多有著以大眾識字化來謀求普及西洋近代知識之目的。

例如，1869年的南部義籌〈修國語論〉（羅馬字採用論，當時上呈至大學首長山内容堂；1871年、1872年則上呈至文部省）、前島密〈國文教育の儀に付建議〉、〈國文教育施行の方法〉、〈廢漢字私見〉（假名採用論，上呈至集議院）等文；以及福澤諭吉《文字之教》（1873年）中的漢字限制論、《明六雜誌》裡展開的各種討論等等。另外亦有假名會（かなのくわい，1883年，會長爲有栖川宮威仁）、羅馬字會（1885年，會長爲外山正一）等組織的成立。

此期間的討論，主要著重於爲了文明開化與大眾啓蒙，應使用怎樣的文字來標記日語等論點。亦即，如何有效率地接收發射「文明」

¹¹ 井上ひさし，本名井上廈，山形縣人，已故知名小說家、劇作家。曾獲讀賣文學獎、谷崎潤一郎獎、菊池寬獎、日本科幻小說大獎、日本藝術院獎等十多項獎項。曾出版《吉里吉里人》等數十部小說、童話與散文著作。

¹² 井上ひさし：《國語元年》（東京：新潮社，1986年）。

軸心的「世界」＝西洋的諸多文物、如何有效率地將它傳播、如何有
效率的普及識字率等相關論點。舉例來說，西周列出用羅馬字標記的
10項優點，其中他提出「機械、特定人物等等，不勉強予以漢字譯
之，應使用原字標記」，且從啓蒙面向強調「認識アベセ（按：ABC）
二十六個字母，並加以學習拼寫規則及念法，則女子亦能讀男子之
書，鄙夫亦能讀君子之書，甚且得以書寫自我意見」。¹³而植物學者
矢田部良吉（1851-1899）也認為，以羅馬字書寫，乃「可省去翻譯
那些近年不斷由西洋傳入的學術用語等麻煩」。¹⁴

不過，討論文字標記的問題，無法忽略文體及語彙等問題；可想
而知，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乖離，並非以文字標記就能解決。即便不
使用漢字而以羅馬字或假名來標記，還是得處理漢字辭彙的問題，因
為在同音異義語辭的視覺上之區別，還是以漢字假名混寫的標記方式
較清楚明白。而即便賦予它們大眾性，即不以漢文訓讀體標記，但若
不盡可能研擬出與口語相近的文體，則其效果也許不彰。甚且，將非
表音系統但具歷史意義的假名用法，刻意轉成僅以羅馬字或假名來標
記，也無法輕易獲得大眾性。

在那過程中，假名會或羅馬字會到底要走向怎樣的文體或表音系
統都還未清楚，即猶未充份發揮作用時，就劃下句點。而這些團體之
所以終結的關鍵因素在於，它們缺少了要怎麼推廣能加以表現各式內
容的各種形態之日語的思考。¹⁵

日本史研究者認為，約莫日清戰爭（1894-1895；即甲午戰爭）

¹³ 西周：〈洋字を以て國語を書するの論〉，《明六雜誌》第1號（1873年4月）。亦收於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註：《明六雜誌（上）》（東京：岩波文庫，1999年）。

¹⁴ 矢田部良吉：〈羅馬字ヲ以テ日本語ヲ綴ルノ說〉，《東洋學藝雜誌》第7、8號（1882年4、5月），收於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共編：《國字問題論集》（東京：富山房，1950年），頁94。

¹⁵ 參見平井昌夫：《國語國字問題の歴史》（東京：昭森社，1948年），或復刻版（東京：三元社，1998年）。

期間，作為民族國家的日本大致成形。¹⁶而過程中，明治國家即透過近似於漢文訓讀體的文體來設計並創造出國家制度；從制訂制度的角度來看，它也是最易進行創造的文體。因為無論是提倡羅馬字論或假名專用論，基本上也都是漢文的脈絡中衍生出的議論。透過這種文體而生成的制度，在法律方面有1880年的刑法公布、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1890年的民法公布等等；教育方面則有1872年的學制發布；1876年，雖猶未齊備，但義務教育制也因教育令公布後制定了；1886年，教育令則轉換成國家主義色彩強烈的學校令，於是在1890年發布了可謂儒教的君臣之道的教育勅語。而軍隊方面，則是1873年發布了徵兵令。

再經過幾些時日的1930年代以降，文體的問題，則進而以將法律用語、醫學用語、教育用語等加以「口語化」的運動形式，並伴隨著標記系統改良的討論，以及在海外的日語普及等面向的相互運動中，往前開展。¹⁷而此「口語化」運動，則與1930年代能自如地創作漢文文章的階層人口漸漸減少之現實狀況有所關聯。例如，1929年7月26日，法官三宅正太郎在名古屋控訴院刑事部，以口語體書寫駁回上訴的判決文，甚至以假名書寫固有名詞。三宅連書寫固有名詞都排除漢字的行為，應是從其「感覺可突破陷入瓶頸而造成堵塞的司法事務」、「以口語體書寫的法律相關著書論文也越來越多。若以口語體書寫，不僅讀的人易懂，寫的人也輕鬆。讓缺少漢學素養的年輕人以文言體來書寫判決文，則其非以判決文呈現思想，而是將思想限於既有框架內」的想法而來，並加以展開的行動。¹⁸

¹⁶ 參見宮地正人：〈日本の国民国家の確立と日清戦争〉，收於比較史、比較歴史教育研究會編：《黒船と日清戦争》（東京：未来社，1996年）。

¹⁷ 具體之相關實踐可參考《國語の愛護》（1935年4月-1937年5月）、《國語運動》（1937年8月-1944年5月）等雜誌。或參考安田敏朗：〈「文体ノ改善」の行方——日本語口語文体の戦中、戦後〉，收於氏著：《「多言語社会」という幻想——近代日本語史再考IV》（東京：三元社，2011年）。

¹⁸ 千種達夫：〈判決書の変遷とその思い出〉，《書齋の窓》第191號（1970

此議論姑且擱置，可先確認的一點是，即便制度完備，並不代表國語就具有可普及至全體國民的內涵。關於此點，則森有禮的主張亦有其符合時宜之處。

2. 言文一致的問題

明治維新以後，就有為消弭書面語及口語之間的差異，而將兩者一致化的主張；西洋學者神田孝平（1830-1898，曾參與明六社）則將此類主張以「言文一致」稱之。神田在〈文章論ヲ讀ム〉¹⁹（〈讀文章論〉）一文中所言的「以平時說話的語言寫作文章，即為言文一致」，可謂此稱最早的例子。²⁰翌年，就有直接名為《言文一致》的書籍出版，作者為國學家物集高見（1847-1928）。此書被如此評價：「積極討論言文一致的問題，並觸及其問題核心，且有如啓蒙書籍般的周詳與易讀，可謂符合時宜的代表性優秀著書，對當時的影響絕不在少數」。²¹而雖物集的立場在於，「即便是依言而書，也無法全如言說一般，因此另當別論；但書寫方式則非留意不可。是故，要依言而書，則要盡可能淺白易懂為佳」，²²然而，他又論及，「雖說文章要依言而書為佳，卻也不是說像在對誰講話那樣，將所有對話或口語等全都寫下來就好……，省略敬語的書寫也是好的方式」。²³如此說法，其簡潔地呈現了書面語、口語，以及言文一致體的樣貌。

另外，物集也認為，如此可保留「我手寫我口（はなす通りに、書く）」的特質，若再加上「通信」力量使之流通至全國各地，則「全國語言得以齊一」；²⁴這樣的主張雖有其獨到之處，卻缺少了現實感。倒是，新聞報紙讓讀者只是片面接收訊息（當然，即便也有投書

年9月），頁14。

¹⁹ 神田孝平：〈文章論ヲ讀ム〉，《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7編第1冊（1885年2月25日）。

²⁰ 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發生の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頁13。

²¹ 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發生の史的研究》，頁282。

²² 物集高見：《言文一致》（東京：十一堂，1886年），第三張背面。

²³ 物集高見：《言文一致》，第11張背面 - 第十二張正面。

²⁴ 物集高見：《言文一致》，第12張正面 - 背面。

等手段)，而「通信」則提供了寫手參與的管道，於此意義下，物集的主張意外呈現可取之效。如此值得關注的立論還有一些，但物集自己嘗試性地將古典書寫加以簡易化的實踐，則更令人深思。他認為若將「時態與連接詞」（時の所と、接続の所）這「兩處加以修改，則千年以前、五百年以前的語言當有不同面貌。遠古的脈絡若成爲今之脈絡，則任誰都可立刻理解」。²⁵而他實際將古典作品開頭的引用，與著眼於表現時態的助動詞，以及附上連接詞與連接助詞所重寫的句子，加以併置地呈現出來，這即是以時態來將言和文加以一致思考所開展的論調。總之，即在特定的操作下（或可謂之翻譯），讓文言文成爲現今的「言文一致體」之意。因此或許可這樣說：其曖昧卻也明白地揭示，「言文一致體」即爲明明白白的書面語。

其他先行研究中亦有關注到此問題或語尾詞的討論，倒是這段物集的敘述值得留意：

別再創作如模仿他人的鸚鵡文了。若能將自己口中說出的那渾然天成、自然湧現的活潑的、生動的語言，加以生動地描寫，則才是真正的好文。²⁶

但可惜，物集並未再深入論及如何將「渾然天成、自然湧現」的語言如實地書寫。

芳賀矢一、杉谷代水所編輯的《作文講話及び文範》（1912）一書中，大膽地將所有文章二分爲實用文及美文，並加以論之。據書中所言，整個明治年間，作家們雖使用了言文一致體，卻也認爲「言文一致體」的文體，「猶有不成文體之處，一不小心就變得粗俗，或偶有冗長之感」。²⁷可見「渾然天成、自然湧現」，以及「質感」與「冗

²⁵ 物集高見：《言文一致》，第14張背面。

²⁶ 物集高見：《言文一致》，第9張背面。

²⁷ 芳賀矢一、杉谷代水編，益地憲一校訂：《作文講話及び文範》（東京：講談社，1993年），頁447。

長」之間的平衡，也是被要求的所在。

作家橋本治則露骨地說：「言文一致體最重要的事，乃『語彙使用者的思考之成熟』。文章中的用語——透過那些用語編織出的內容，若未成爲「自我之物」，則無法向人自在地傳達欲言之事——有這種內在融會貫通的基礎，才是真正的『我手寫我口（話したごとくに書く）』之言文一致」²⁸（卻也是很實際的說法）。但在此須提醒的是，以「渾然天成、自然湧現」的辭彙來書寫之事被加以訓練——而擔任此訓練者爲「作文」這門學校教育科目——它成爲當時的大潮流，且確實地反映於教育上。

總之，所謂「言文一致」，並非如何言說就如何書寫，而是能創造出新的文體才有了意義。而要再確認的一點是，能否將「渾然天成、自然湧現」如實書寫，終究只是在教師的「循循善誘」這個脆弱的前提下，所展開的討論而已。

即便如此，此後，於文學家們等等之間的言文一致之時機愈趨成熟（倒是，物集高見卻不再主張言文一致了）。

在日清戰爭前後，文字標記的問題，則以國語國字問題之名被再次聚焦，言文一致的主張仍然持續，另外也有國語的具體內涵需要整頓的相關論調。

而要再提的一點是，在幕末以降最有名的和英辭典——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著的《和英語林集成》（初版：1867；再版：1872）中，猶未有“KOKUGO”（國語）這個詞條；但大幅增錄更多詞條的第3版（1886）中，則出現“KOKUGO”這一詞條。當然，亦有如前所述的〈修國語論〉（1869）或《百學連環》（1870）中的事例，但明治時期經過近二十年後，「國語」一詞，在被和英辭典收載之前，已被普遍使用了。於此的“KOKUGO”，則以“The language of a country; national language”等加以記述。不過，光

²⁸ 橋本治：《言文一致体の誕生——失われた近代を求めてI》（東京：朝日新聞，2010年），頁168-169。

憑此辭典並無法完整說明國語一詞的內涵，以下，稍再附加說明。

三、制度的自然化——民族主義的時代之中

(一) 自然化的言論——

上田萬年〈國語と国家と〉(〈國語與國家〉)

一般認為，明治初期的歐化主義後來搖身一變轉為國粹主義，是在明治二十年代（約1887年前後）；這與日清戰爭之際，日本的民族國家型態已大致成形有關。明治二十年代初期創刊的《日本》、《日本人》等雜誌中，把“nationality”這個詞翻譯為「國粹」，於是以「保存國粹」之姿來強化「日本」這個意識的議論被加以展開。²⁹ 這些背景亦可視為民族主義路線的漸次鋪展，而國語的相關議論亦受其影響。

要完成國語的制度化，必須賦予國語既是國家語言同時也是國民語言的意義，因此，民族主義的力量不可或缺。而實際上，內含著標記或言文一致等問題的國語建構被急速地推展，也與日清戰爭之後高漲的民族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森有禮所未竟的國語制度化之事業，則由國語學者上田萬年³⁰

²⁹ 可參考山室信一：〈国民国家・日本の発現——ナショナルリティの立論構成をめぐって〉，《人文学報》第67號（1990年12月）。

³⁰ 上田萬年（1867-1937），出生名古屋藩在江戶（今東京）的公家宅邸。1888年畢業於帝國大學和文學科。曾志於近世文學之研究，後受教於當時的招聘講師 Basil Hall Chamberlain 門下，而專攻博言學（即今之語言學）。而後受外山正一與加藤弘之等人推薦，前往德法留學（1890-1894）。回國後任職帝國大學教授至1927年。期間亦兼任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國語調查委員會主事、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長（文學部部長）、神宮皇學館長、臨時國語調查會會長等要職。於擔任國學院大學校長（1927-1929）時期，建構了近代國語學之基礎。上田的《國語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895年）、《國語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903年），卷2等代表作中，不僅充滿國語愛的論述，亦有國語的科學性之研究等具體的方法論。另也出版不少共同著作，包括《日本外來語辭典》

加以接續。上田將日清戰爭期間高漲的民族主義與日本這個個別的存在加以連結，而進一步將國語定位為國民血肉之化身。

上田萬年奉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加藤弘之（1836-1916）之命，為「修習博言學」（按：即語言學）而赴德國等地學習語言學。上田歸國後，於1894年所演講的〈國語與國家〉，³¹極具其語言主張之代表性。

加藤弘之在1880年時，就提出可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修習博言學」的計劃。他在東京學士院會中提議，「現今欲修正我國語言並設定其文法，則必須先以此博言學來廣泛通曉東西二洋諸國語言之大概，究其長短得失等，而後始能著手此事……可任命一二名俊秀之才前往歐洲留學，習得博言學」，並以學士院之名向文部長官提出建議。³²但此議遭西周反對，而學士院全體也傾向支持西周的意見，以致該計畫付諸流水，³³即便如此，可見為了建設作為制度化的「國語」，當時這項以「科學」為基礎的「博言學」，乃被視為必要的學問。

而〈國語與國家〉中提及的「日語是四千萬同胞的日語，非僅僅是十萬二十萬上流社會或學者社會的語言」這點，值得留意；亦即，其將日語定位於全體國民所共有的語言。甚且文中認為，「千島之境、沖繩之端」亦為日本國家之領土；一個國家乃由有共通歷史的「一個民族」構成，而成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之事可謂「國家之一大喜事」這個邏輯被建構起來。基於如此邏輯，上田斷言：「遇未料之秋時，我們日本國民得以協力運動，乃因擁有忠君愛國之大和魂及舉國同一的語言，大和民族之根據即於此」。他認為，與古今東西各國相比，日本這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理想型民族

（高楠順次郎）、《大日本國語辭典》（松井簡治）、《古本節用集の研究》（橋本進吉）等書。

³¹ 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東洋哲學》第1卷第11、12號（1895年1、2月）。

³² 《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2編第1冊（1880年3月），頁9-10。

³³ 《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2編第2冊（1880年3月）。

國家乃屬相當稀有之例。總之，這裡透露了上田的觀點，即歐美並非為追逐的模範，單純只是比較的對象，且日本是居於優勢的；由此亦可看出明治後半期的民族主義之樣貌。

上田進一步解釋，對「母語」的愛就等同於對母親的愛，並說，論斷自己語言的好壞，就等同對自己雙親或故鄉說三道四；就如對父母或故鄉之愛沒有選擇的餘地，對國語之愛也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這才是「真正的愛」，這也等同於對皇室之愛。³⁴

這樣的國語被視為日本的「精神性血液」，它成爲可「證示爲精神上的同胞」之物。以下再引用其文：

語言，對言說它的人民來講好比血液一般，可證示爲身體上的同胞，亦可證示爲精神上的同胞；若以此譬喻日本國語，則日語可謂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以此精神血液維持；日本的人種，因有此最強固最能永久長存之聯繫而不致散亂。是故，一旦大難臨至，只要有此語言號召，則四千萬的同胞無論何時皆能傾耳垂聽，無論何處亦願赴之，鞠躬盡瘁，不惜一死。而一旦接獲慶訊，無論千島之際、沖繩之端，皆能齊一敬拜祝賀君王千秋萬代。

因國語乃爲喚起國民意識所不可或缺之要素，所以上田繼續展開「研究國語」、「整建國語」等主張。

於上田的議論中，「日本的人種」，即「大和民族」，其內部的多樣性，無疑是被忽視的。尤其他雖也提及「無論千島之際、沖繩之端」，但居住於當地的「大和民族」以外的人民卻也完全被忽略了。日語中，“nation”的譯詞，「國民」與「民族」兩者皆通，也因此兩

³⁴ 上田的〈國語と國家と〉等初期論文收於其首部著作《國語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895年），封面扉面的題字——「國語は帝室の藩垣、國語は國民の慈母」，極具象徵性。《國語のため》之訂正再版（東京：富山房，1897年）以及《國語のため》，卷2，於2011年重新出版。

者間的差異就不太被注意到。於是，日本國民＝日本民族，而它們使用同一種「國語」，這樣的等式就被輕易地勾勒出來。

（二）國語的歷史化

上田萬年又更進一步地溯源了國語的歷史，其於1895年向帝國大學校長陳請設置國語研究室的文書，即一例證。

微臣以爲，我大日本帝國國語，乃自 皇祖 皇宗以來，即爲彰顯我國民性之思想，所謂大和民族之精神性血液之物。人種結合仰賴之以增其強固；教育施行因之而能附有國民性之本質。因此其能探究過去之歷史，亦能洞察現今狀況，而後能打造未來之隆盛，確實可謂國家自身應成之義務。此立憲之制業已確立，教育方針亦已擬定，今日已無須再喋喋強調。況且帝國版圖重新擴張，發揚國光實已於空前絕有之際。唯就此吾輩國民可再熱心研究之點，乃以如何手段盡其義務……。於此，小臣相信，我文科大學內中創立其研究室，於此網羅其研究資料，於此教育有爲子弟，以精密之科學智識及方法，將此廣大深遠之事業從各層面漸次順理地加以解釋之，乃最上策……。³⁵

「帝國版圖重新擴張」，即1895年日清戰爭後的台灣領有。文書中認爲，所謂「國語」，乃擁有皇祖以來之具「歷史性」的「大和民族之精神性血液」，以「國語」來擴增統合，教育始成爲可能，國語也因而能「附有國民性之特質」。

「國語」，被視爲與古代日本一樣歷史悠久、爲貫通古今之物。而值得注意的還有，國語也與「萬世一系」的天皇家族並置而被加以

³⁵ 上田萬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に國語研究室を興すべき議〉，收於明治文化資料叢書刊行會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東京：風間書房，1975年），卷8；標點符號爲譯者所加。

論述。上田爲了研究如此具有「歷史」的「國語」，且要以「嚴謹的科學智識及方法」來闡明「過去的歷史」、「現在的狀況」、「未來之隆盛」等事，而主張在帝國大學內設置國語研究室。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亦是爲向國家請求預算而寫之文。

總之，近代民族國家所要求的是，於現今的時間點——共時性的現今——盡可能去設定一個可涵蓋來自各地被認定爲「國民」的人們所居住的範圍那樣，可共通的語言變種。即如前所述，此乃爲使以法律等支撐並經營的民族國家之制度，得以效率地運轉，所不可或缺的工程。

然而，要醞釀出以民族國家之成員爲前提的一體感，僅有橫向的共時性的現今之一體感是不足的，還得要有一個縱向之通時性的——亦即具有「歷史性」、「傳統性」的，得以受到保全的一體感才行。例如，爲不使「一千年前的國語」、「一百年前的國語」等說法不致於突兀，則有必要使其具有轉變成現今的國語且是延綿不絕的連繫意識。這樣的思考，如同現今無法掌握九世紀中期的《竹取物語》的文字之意，乃因現在與九世紀中葉這兩個的時間點是切割的，而致其意義難以明瞭；但若將兩者間的轉變加以闡明，則兩者間即能有所連結。若能累積這類事例，則能使國民生出我們共有著一個「歷史」、「傳統」等意識；學校教育的「國語科」中教授「古典」，即是爲了連結那共有的意識。例如，指飛鳥、奈良時代的歷史爲奈良地方史者，則被指爲胡說的那種學校課程觀點——其將地方史置於日本全國這個座標下的古代日本史觀，即是爲連結此共有意識。

總之，國語不僅被要求能使統治有效率，它和國旗或國歌一樣，被賦予著統合國民的象徵功能，甚且還被加諸了過度的精神性與民族性的意義。

而像這樣的回溯歷史，乃是森有禮的英語採用論中怎樣也無法兼顧的要點。森有禮與上田萬年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都在追求一個於橫向的共時性之現今，具有可喚起國民一體性之功能的國語。但，

上田以追溯國語的歷史性，來提出國語和其他語言間的差異，以及作為日本的個別性：縱向的通時性之一體性。而森則只「將日本歷史以皇室作為中心而來的傳統加以描繪」，³⁶這在當時不算是太特殊的歷史觀，但比起紮實地建構國語，他選擇將建構國家制度置於優先；或許這也可謂時機的問題。森有禮在1872年以降就不再發表語言問題的相關論述，但若非其於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之日被刺殺，或許其主張也能延伸至如上田的思考層次吧！

此話題暫且擱置。上田的〈國語與國家〉中有個可關注的問題是，在日清戰爭正如火如荼之際所進行的這個演講裡，上田認為，即便「支那的武力早已不如日本」，但「世人乃蒙昧於效法支那文字之弊，不假思索地濫用漢字漢語。甚且把支那人所用語句，隨意置入日本文中，則屬於日語的日文之獨立，究竟要待到何時」；即上田進而主張日本文字或文學應從「支那」「獨立」出來。總之，隨著民族主義的擴張，國語被加以論述；再進一步而言，上田已想像出在國際關係之中，國語被言說的藍圖。

就在上田論著「國語乃為國民的精神性血液」時，作為制度的國語則被拋至後位，那人種式的譬喻——如血液一般無可替代之物，或如生之母、育之鄉土之類的譬喻中，無能自由選擇之「自然」的「真正」的國語，則漸漸被闡述出來；而那無有血液流通的制度，則漸漸被理所當然地自然化。雖是由上往下強制施行，國語也漸漸成為本質、成為身體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對於由上往下的強制施行，照理說會令人不自在，但讓人們以為國語如同是與生俱來（自然地）般的結構，已於此完成。

又，上田萬年於1903年的課堂筆記中，亦有如下敘述：

國家和語言的關係，若將其視為於歷史中的關係，則自然與物理性的關係無所連結，是故，我等於此又有更大憂心，國民應

³⁶ 長谷川精一：《森有礼における国民的主体の創出》，頁278。

藉日語加以團結不可。³⁷

上田並未懷疑國家和語言之歷史性關聯，但重點在於，若不將那關聯偽裝成「自然與物理性的關係有所連結」，則無法使「國民因日語而團結」。總之，關於制度的自然化，無論上田的認知程度為何，但其一再強調的即是國家和語言間那不證自明的關係。

自此時期後，也出現了如「國語中賦有國民精神」的說法。例如，上田萬年的弟子，亦曾參與國語政策制定的保科孝一（1872-1955），有如此觀點：正因「國語涵養國民性精神，不僅陶冶國民品性，亦是最有力量之物」，則養成「愛國語心」乃有所必要；而「無論我們如何愛著國語，那國語卻未有相當的整頓，甚且，教育也極不完備，這樣終究無法達成養成國民性精神的最大目的」。³⁸ 然而，必須思考的問題是，把表現制度的「國民」這個單字，與「精神」這個非制度性的單字加以連結，如此「國民（性）精神」這個用詞就此成立，而國語中賦有國民精神這個思考，即顯示了國語這個制度被自然化了。

總之，國語，乃是制度；而它因被定位成猶如國民自古以來就使用至今的語言，所以在現時中，其亦能確保國民之一體性的存在。

而只要「國民精神」附於國語而非方言之中，則言說國語即自然地被要求；也因此，矯正方言的工作，亦成為教育的一環被加以推動。

（三）標準語的設定與方言

就這樣，透過制度化及自然化，國語被逐漸建構起來；而更具體的實踐，則是標準語的制定。

以下則就此點簡略說明，在〈國語與國家〉演講翌年的1895年，

³⁷ 上田萬年：〈國語學〉（渡辺修翻刻解題），《大妻国文》第7號（1976年3月），頁129；標點符號為譯者所加。

³⁸ 保科孝一：《國語教授法指針》（東京：寶永館，1901年），頁16。

上田萬年所發表的標準語論。³⁹ 上田將“standard language”譯成「標準語」，這在日本則被認為是「有教養的東京人所言說」的東京話（東京語），它從本來定義模糊不清的「東京方言」（東京のことば），就此進一步被具體化成為標準語。而因「標準語」成為「較其他各地方言純正絕佳，且能將各方言去蕪存菁地網羅篩選，再加上還有一些相關研究，因此應能成為融合統一並加以定型化前述方言的語言」；甚且，這個基準非得是某種正被言說的語言之變種不可，而不能從古語中找出標準。總之，相較於「傳統」，大家皆能言說一事，是更被重視的。

而為確保「標準語」的地位，則須使它「成為文章上的語言」，因此要累積「教學、議院、法庭、戲劇或落語說書場所等，以及文學」等場域的實用和研究。這基本上是從德國語言學家赫爾曼·保羅（Hermann Paul, 1846-1921）的《語言史原理》（1880）中的論述而來。上田在給東大學生上課時，即以此書作為參考書，可能其受赫爾曼·保羅的影響極大。而上田的獨創見解，則表現在其對教育的重視，「讓最大多數人，能把標準語運用自如，謂為教育之效力」。⁴⁰

關於標準語和方言會有怎樣的關聯，容後再述。誠如1902年的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方針所列的「調查方言，選定標準語」一項，所謂方言，乃是在論述與標準語的關係中被闡述之物。即採集並研究方言，乃為了選定標準語；但實際上，方言卻也被認為阻礙了標準語的普及；由它的「因襲」（舊有、傳統）等理由而成為要被打倒的對象。另外，也如「方言中保留古語」的說法所呈現的，方言提供國語所需的通時性（歷史性）之參考；而就在被國語排除與收編的

³⁹ 上田萬年：〈標準語に就きて〉，《帝國文學》第1卷第1號（1895年1月）；後收於《國語のため》。

⁴⁰ 關於上田的標準語論，或其受 Hermann Paul（1846-1921，德國語言學家）及 W. D. Whitney（1827-1894，美國語言學家）等人論述之影響，可參考安田敏朗：《〈国語〉と〈方言〉のあいだ——言語構築の政治学》（京都：人文書院，1999年），第1章。

拉距中，方言被詮釋出來。⁴¹

於是，在1900年前後，國語被要求具有撐起制度的機能；而爲了使其更加完美，它被要求成爲國家層級的標準語。然後，標準語也被賦予「真善美諸品德」的價值觀，被認爲是提升社會地位所不可或缺之物，於是，言說國語這件事漸漸被無條件地要求。但言說標準語的欲望，事實上只是言說者將標準語的強制性加以內化罷了。

就這樣，爲圖國語和方言的序列化，透過國語中賦有國民精神的言說，那序列化成爲絕對性的存在而被固定下來。⁴²

(四) 國語教學——以作文教育爲例

1. 初等教育與作文——日用文書與思想的表達

具體而言，國語在學校裡如何被教育呢？以下以作文教育爲軸概略討論。

「作文（さくぶん）」這一辭彙，取自創作漢詩漢文之意的「作文（さくもん）」而來。於1872年的學制裡被制定的「作文」科目（下等小學教則）^{2*}之內容中，即有書寫「簡易書信文」一項。而以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爲據，所提出的小學校教則綱領（1881）第11條中，則有如下敘述：

⁴¹ 詳細論述參見安田敏朗：《〈國語〉と〈方言〉のあいだ——言語構築の政治学》。

⁴² 這樣的標準語也在殖民地加以普及，卻遲早也將成爲一種反作用力，刺向日本內地。例如，1940年代的朝鮮總督府之官吏曾有如下記述：「有位半島（按：朝鮮半島）的好友曾跟說，我的國語不會像內地人一樣混雜方言，因爲我講的是跟學校教的一模一樣的國語，是漂亮的標準語。我聽了冷汗直流。當半島人們持續費盡心血苦修常用國語時，我們內地人怎能不加倍努力把標準語講得更好呢？」參見廣瀨續：〈國語普及の新段階〉，《朝鮮》第329號（1942年10月），頁43。

^{2*} 譯注：明治五年（1872年）8月3日學制公布，8年制的「小學校」（小學校尋常科）因此成立。其中分爲4年制的「下等小學」（6歲學齡起4年）與4年制的「上等小學」兩階段。

初等科的作文，乃就平近事物，解釋其性質等並以之為題，先以假名拼寫單字短句等，稍進一步則摻以簡單漢字，再交雜書寫簡短假名。與其寫作舊式口頭文書，則可進而書寫日用文書。而於中等科與高等科，寫作日用文書之外，則可紀錄已習得之知識或感想等文。⁴³

亦即，「日用文書」的寫作被置於重點；而書寫固定型式的實用文，即作文教育的實踐。先行研究中也指出，至十九世紀末之前的作文教育，可謂「形式主義式的教育」。⁴⁴

即便如此，同為小學校教則綱領的第3條中，則有如下旨意：

讀書與作文的要旨在於，知曉普通的語言和日常須知的文字、文句、文章讀法、寫法及意義。以適當的語言及字句來正確地培養表達思想的能力，兼以啓發智德。

「以適當的語言及字句來正確地表達思想」一事，終究無法避免落於形式主義的框架；而基本上，作文為「正確地表達思想」之言辭，綜觀1900年的讀書科、作文科、習字科等科目，國語科在被設置於初等教育時就已被承襲，而至1941年的國民科國語成立之前，未有變化。⁴⁵

從先行研究中可知，明治時期的作文科之設置，其著眼點在於簡易文書的教學，對於暗記冗長的表現等等也加以批判。⁴⁶倒是，事實上，能書寫形式性的文章已相當足夠，且亦是最實用的。但若僅止於此，國語則無法成為「自己的東西」，甚至也無法加以灌輸其為國民的語言、國家的語言等意識。

⁴³ 標點符號為譯者所加。

⁴⁴ 滑川道夫：《日本作文綴方教育史：明治篇》，《日本作文綴方教育史》（東京：国土社，1977年），卷1，頁30。

⁴⁵ 甲斐雄一郎：《国語科の成立》（東京：東洋館，2008年），頁14。

⁴⁶ 甲斐雄一郎：《国語科の成立》，第2章。

即便先行研究中還未有相關論證，但那「表達思想」之言辭，或許就是爲了補足這個缺口而出現的。倒是，1893年至翌年之間，擔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長）的井上毅（1844-1895），即曾強調國語教育（已有言文一致體的觀念）在「思想的交流與溝通」上的必要性。⁴⁷亦即，企圖以言文一致作爲手段，以「表達思想」作爲目標，而實施了作文教育。而若能以國語來書寫心中所思所想，則國語即成爲身體的一部分；在那過程中，言文一致的文體相對而言是較能實踐的。

然而，從結果而論，「表達」的「思想」（或說要讚揚哪些思想），則是由教師所給予的素材而來。

教師用參考書《小學校令準據實用教授法》⁴⁸中，僅有「作文，乃以教授學童們能夠使用文字與抒發思想感情爲第一目的」之辭，而關於「思想感情」之內涵則未有著墨。而事實上，對於低年級而言，被認爲適當的教授方式，並非採用讓兒童自由發揮的「自作法」，而是「輔助法」。例如「範例文」的教學，或者「教師向兒童提出問題，引導他們寫作文章」之「共作法」等，是當時較被推薦的方式。⁴⁹

或許就現實面的操作而言，教育方式非得如此施行，但明治時期的作文教育目標仍是「以適當的語言及字句，來正確表達思想」。而其中，「適當的語言及字句」爲何，則是最先被關注的問題；此與前述之言文一致的討論亦有所關聯。

2. 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

此節首先討論上田萬年的演講——「作文教授法」；其內容於上田自歐洲留學歸國隔年的1895年7月出版成書（演講極可能在歸國後不久即進行）。上田的《國語のため》亦在此年發行，而論及小學校的作文教學之《作文教授法》一書的〈はしがき〉（序文）中，亦

⁴⁷ 甲斐雄一郎：《国語科の成立》，頁258-260。

⁴⁸ 參考1901年初版與1913年改訂之第17版。

⁴⁹ 立柄教俊：《小學校令準據實用教授法》（東京：目黒書店，1901年；1913年改訂17版），頁98、105-106。又，作者立柄教俊曾於1910年開始擔任朝鮮總督府學務局編輯課編修官。

記有參考《國語のため》之事。其中，上田強調因時代更迭，國語也隨之發達起來：

於今，舊幕府時代的人仍如是說，謂習得漢學自然能書文章，然不習漢學則未能為文。這剛好和四五十年前德國老派學者所言，習得拉丁語則能書德文的說法相同，至今仍有一些人如此主張。實在是這些學者不知曉，無論日本或西洋都各自發展其國語，使其國家地位能更加優越之事。⁵⁰

上田以此提倡國語的自立，又謂，「以語言整理思緒且加以言說，以及馬上將言說轉換為文字形式加以紀錄，乃普通教育中的作文教學之大重點」。所以他認為，漢字可於後來再加以熟記，首先只要能以假名書寫文章即可。⁵¹ 這部份的理論開展，的確很有主張漢字全廢的上田風格。也因此他再論，「教師最需重視口語並加以教授」，而結果「或可能成為方言式的文章。但即便如此，只要是按所思所想去寫，也遠比怪里怪氣又半舊不新的文體來得便利且優美」；而追求「高尚的文體」，則也是後來再加強即可。⁵²

當然，推動「言文一致」，「應意識到目前中部地方的腔調等等也勢必出現在文章裡。縱然地方腔或許也有難以聽辨的語彙，卻也比使用一知半解的漢語或洋語好太多」等等的思考也被呈現出來。不過，上田卻是樂觀地預測「地方腔」遲早消失，而從容不迫地說，「這種言文一致流的文章若是駕輕就熟了，則每個人可各自隨心所欲地，創作出各自不同的文體」。⁵³

如此從容不迫，也顯示山上田並未意識到言文一致在本質上的問題。亦即，只要自由書寫即能形成統一的語言，實可謂夢話一般；很

⁵⁰ 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東京：富山房，1895年），頁5。

⁵¹ 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頁7。

⁵² 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頁24-25。

⁵³ 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頁26、29。

明確的事實是，自由書寫與統一的文體是兩個完全不同方向的開展。沒有規則的自由書寫，僅會造成混亂而已；在其中加以規制即為教育，這才是國語教育的本質。而在規制與規範中取得平衡，進而習得寫作方法，則似乎是接受學校教育者們的「正確」方式。

另外，從唱歌教育的角度來看，於其中置入身體裡的，基本上是文言文。因為還未習得可「自由書寫的文體」前，學校教育已先提供一個可接觸新的「範本」、「歌唱範本」的空間。⁵⁴

有點離題了。不知上田的態度為何如此樂觀，但也許與其生長環境（生於名古屋藩的江戶宅邸），或其被以精英式培育等經歷亦有關；或者，也可能是演講者原就得展現樂觀見解吧。

3.〈尋常小學の作文教授につきて〉（關於尋常小學的作文教授）

上田萬年另一本與《作文教授法》同於1895年發行的《教員文庫國語論》一書中，收錄〈尋常小學の作文教授につきて〉一文，此文乃上田為其熟識的教師編輯的69篇尋常小學校三年級生的作文冊《我的家》所寫之評論，內容與《作文教授法》中的主張可相呼應。例如他提及，「可憐的小學兒童，猶未能完全將所思所想轉成口語時，竟就得學習書寫文章……首先應把教學重點置於，引導學童整理思緒並清楚表達，再培養其將口語如實訴諸文字的習慣」，他也具體地引用作文來指出，「文章體」和「談話體」混用的文章變得冗長後，則成了「談話體」式的文章；而「這乃是讓此輩兒童記其所思，談話體較文章體較佳的例證」，因此不使他們書寫古語或漢語，而「現今的日本語，只要不過於卑俗，儘可能也將之收於文章為宜」。⁵⁵亦即，其鼓勵使用現代語來書寫，而這與其對「談話體」的重視有關。在上田的思考中，「普通文」的重要性是，比起追求美文，明瞭

⁵⁴ 渡辺裕：《歌う国民——唱歌、校歌、うたごえ》（東京：中公新書，2010年）。

⁵⁵ 上田萬年：〈尋常小學の作文教授につきて〉，《教員文庫國語論》（1895年），頁5、9、11。

易懂是較為要緊。但是否淺白易懂的關鍵在於語彙的選擇，如其所謂「小學校的作文科，若是無上限地要求兒童言其所思，且進一步書其所言，則對這些孩子而言，如同被要求自行選用辭彙，未免過分。……而小學校尤其是尋常科的作文教學，語彙選擇則應在教師的注意督導下進行」，⁵⁶總之，他認為雖然作文科教育是讓所思所想能被書寫，重點還是教師的語彙選擇。相較於物集高見所提倡將那「渾然天成、自然湧現」之事直接寫下的言文一致理念，則有倒退之感；而從其論述亦可看出，作文科這種在教育第一線上的「先言所思而後書」，有其可能性與侷限性。

4. 《普通教育の危機》（普通教育的危機）

「先言所思而後書」，可謂淺白易懂的主張，亦是讓國語身體化的必要工程。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基於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比率不高的社會現實，所提出的主張。上田萬年在提倡限制漢字、採用表音假名等等之論著《普通教育の危機》（1905）一書中，舉1903年的文部省統計為例，謂相對於尋常小學生人數約400萬、高等小學生人數約100萬（加起來約一成人數）的數據，其強調中等教育的中學校、高等女學校的在學人數卻僅約12萬人，而大學生也僅約4000人。正因有如此差距，他主張應簡化標記文字系統，使國民在初等教育中更紮實地完成文字教育。⁵⁷而他又進一步引陸軍省年報登載的1903年徵兵檢查時進行的學歷調查，指出受檢對象約34萬5千人，其中擁有高等小學校畢業以下學歷者約33萬5千人，而尋常小學校以下畢業者約27萬5千人（含非識字者約5萬4千人）。亦即，軍隊中約八成擁有尋常小學校四年畢業以下的學歷，所以「今日代表國家，為吾人捨身取命戰鬥之人，……竟多是未受教育、沒有金錢之人」。他又如此敘述：

⁵⁶ 上田萬年：〈尋常小學の作文教授につきて〉，《教員文庫國語論》，頁13。

⁵⁷ 上田萬年：《普通教育の危機》（東京：富山房，1905年），頁59-62。

爲了這些僅能接受尋常小學四年教育的人們，我抱著極度的同情，我們要盡全力朝二年內修得四年內容，四年內習得八年內容的目標，來實施教育。若不這麼做，我無顏立足於他們面前。即便受了小學教育也無法寫信，收到思念的父母或妻子的信也無法閱讀，且連自己要試著寫信也寫不出來，諸如此類的事，怎不令人感到悲傷？……而教育的實行若無法讓平時居在底層、熬苦工作者們在有朝一日得不惜生命爲國家一戰時得到慰藉，則我必須說，這個國家命運可危。⁵⁸

兒女寫信給父母或父母寫信給兒女的機會並不常有，招致全國民面臨此狀況，可謂拜徵兵制所賜。例如《日本軍人用文》（內山正如編，博文館，1891年）一書，即是合乎當時情狀的實用例文集，暢銷一時。內容一半以上是英雄事蹟或軍事資料，卻也收錄了附上假名拼音的書簡例文（文言體）。

無論如何，1905年5月20日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內的國語學會所進行的《普通教育の危機》演講，剛好發生在日俄戰爭的日本海海戰一週之前。就算上田不是敏於觀察時局的人，也不難思及此觀點。這能「賦予慰藉」之於捨命保衛國家的人們，乃教育事業之主張，究竟是上田出自真心所言，還是爲了補足其向來的漢字限制（全廢）或使用假名拼音化主張，則未有定見；又或者兩者皆是。但不能忘記的是，軍隊、戰爭，曾是促使人們書寫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國語調查機關的設置

約莫1900年前後，國語調查機關開始運作，此與日清戰爭後民族主義的高漲，以及整頓國家制度的進展，不無關係。

如前所述，東京帝國大學的國語研究室於1897年設置（上田萬年

⁵⁸ 上田萬年：《普通教育の危機》，頁64-65。（按：尋常小學學制共8年，前階段的4年爲「下等小學」，後階段的4年爲「上等小學」。）

爲首任教授)，其後，國語學研究者可謂輩出。

另一方面，帝國教育會會長辻新次，於1900年向帝國議會提出〈國語國字國文ノ改良ニ關スル請願書〉，在眾議院和貴族院也以「建議案」形式通過表決，而後設置了含上田等8位人員組成的「國語調查會」。然而，此調查會隔年的預算卻在議會遭到否決，最終才在1902年3月底以「國語調查委員會」之名獲得官方正式承認。而4月時，加藤弘之被任爲委員長，上田萬年被任主事，共11名人員得到聘任。此國語調查委員會於1902年7月發表的基本方針中，針對國語提出以下請求事項：⁵⁹

- 一、文字得採用音韻文字（拉丁文字），並調查使用假名羅馬字等之利弊。
- 二、文章得採用言文一致體，並進行相關調查。
- 三、調查國語之音韻系統
- 四、調查方言，並選定標準語

亦即，根據標記系統、文體、音韻方言等調查結果，選定合乎國語內涵的標準語。而其中第一項，與其說是承繼明治初期的爭論，但其實是與日清戰爭後對「支那」的態度改變，以及引入重視拼音文字的歐美語言學有關。

此四項方針發表之前，委員會透過政府公報集思廣益，以下爲其中幾條事項：

- 一、關於假名使用調查事項
- 二、關於文體調查事項
- 三、關於方言調查事項
- 四、關於發音調查事項

⁵⁹ 關於國語調查委員會設置，以及其後的國語政策機關之百年歷史等資料與概略，參見文化廳編：《国語施策百年史》（東京：文化廳，2005年）。

五、關於國語教授法事項

六、小學校中的國語教授實驗結果

關於方言及發音的調查，則曾於1903年以問卷方式，透過各府縣的教育會及師範學校進行調查（即便於今看來實屬粗糙）。其結果收錄於《音韻調查報告書》（1905）、《口語法調查報告》（1906），其中則各別附錄《音韻分布圖》（29張）及《口語法分布圖》（37張）。其後，以此些調查為基礎，自1904年至1906年加以整理，於1916年出版了《口語法》，1917年也發行了《口語法別記》等書。像這樣的全國性調查得以實施，國家層級的國語調查委員會之設置，可謂促成的重要關鍵。而透過教育會或各級師範學校來進行調查，亦是反映了當時的教育制度普及狀況。另外，此調查的確有許多不完備之處，因此1908年的第二次調查中，問題項目也多了兩倍。倒是，這些於東京收集的調查資料並未出版，於關東大地震（1923）時被燒毀了。不過，曾擔任資料分析的方言學者東条操（1884-1966），則以這些資料為據，於1920年代後半開始提倡「方言區畫論」，嘗試將方言置於國語之下位，並將各方言之間的關係加以緊密連結，進而建構了方言學的理論。⁶⁰

而方言在這些調查中如何被認識呢？《口語法》中有此說法，「現今，雖只一味採用東京裡受教育者們所言說的口語作為標準，但若有其他各地方之間所廣用的共通之口語規則，亦可稍加斟酌參考」，其明確界定了「口語」的基準，多少也可看出對方言的考量。但後來出版的《口語法別記》（1917）中，方言的相關問題，則僅在古語用法和各地口語用法的介紹中被提及。

即便方言未能成為標準語，在人為選擇下被排除的方言，卻在以國語之名下被加以梳理，而成就了相互的關係。從各種方言調查票即

⁶⁰ 參見安田敏朗：《〈国語〉と〈方言〉のあいだ——言語構築の政治学》，第2章。

可知，所謂方言調查，結果還是與標準語一對一的相應形式被加以蒐集；亦即，方言只能是在對應國語或標準語的關係下才成立。藉整理方言的名目，標準語的同時代性被加以建構；而另一方面，在追溯歷史性的變遷之中，縱向的通時性之民族性才被建構出來，繼而國語的概念得以形成。換言之，國語成爲民族性的構成核心，其「歷史」被言說，民族性被賦予其中，進而日本的國語這個概念之固有性被強調了出來。

四、國語的國籍問題

(一) 作爲同化手段的口語——大槻文彥的困惑

以下的討論，當然也能以調查整理國語內涵的框架來理解，但事實卻是隨著時代的進展所產生的新問題。例如，作爲制度的國語，能否適用於臺灣或朝鮮等殖民地的問題。

如前所述，上田的論述中並沒有居住於日本之「大和民族」以外的人民之概念。但時代往前推進，若無視這些存在，則恐怕危及國語論述的正當性。

例如，在國語調查委員會成果之一的《口語法別記》之序言中，國語學者大槻文彥（1847-1928，日本首部近代國語字典《言海》〔1889-1891〕作者）有象徵性的論述：

該如何制定口語的依循準則呢？……現今的東京因有皇居、政府等所在，因此全國的人們漸漸開始模仿起東京的腔調，故將東京方言作爲日本國內的口語標準，我認爲是理所當然。……將東京中有受過教育者的語言立爲基準，另也汲取一些在全國中較普遍的詞彙，然後制訂其規則，如此，即完成了本書所謂的口語。台灣朝鮮亦納入我國版圖，爲使當地人也能成爲我國子民，首要工作即是教授我國之口語；甚且則必須將口語立出

一定的規則。而口語法，確實是當今必要之物。⁶¹

亦即，爲了找出規範口語的準則，而進行了全國性的調查，但原初參考的基準其實就是「東京方言」（東京言葉）。由此亦可知，當時他們認爲若無法找到口語的規則，要進行語言教育也有所困難。

正如上田在請求於帝國大學中設置國語研究室的文章所言，爲調查「過去的歷史」及「現在之狀況」，東京帝國大學國語研究室或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會陸續成立。而也如前所述，國語調查委員會於1903年的全國性調查中，即便不甚齊備，卻也進行了口語法、音韻等調查，而完成《口語法》一書。由此可知，當時就有將現今被言說的語言加以標準化的意圖。無論當時「言文一致」如何被論述出來，但口語亦可爲書面形式語言的這個面向是被充分意識到的。而說「口語」的概念意涵隱藏著書寫的可能性，毋寧說作爲教育的可能性，它被置於首位思考。

而口語教育的對象，也未必僅限於日本民族，文獻中明確記載受教育的對象延伸至「臺灣朝鮮」等地的人民；即「口語」成爲一種同化手段，而這也是經過通時性建構與共時性建構之後的國語之下一個目標。換言之，上田所言的國語之「於未來的隆盛」，於此可謂總結。

（二）考量之名，排除之實——山田孝雄、時枝誠記的討論

距大槻主張之後的25年，即日本帝國擴張至最大極限的1941年，國語學者山田孝雄⁶²拋出了「國語爲何」（国語とは何ぞや）這

⁶¹ 大槻文彦：〈端書〉，文部省編：《口語法別記》（東京：國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1917年），頁2-3。

⁶² 山田孝雄（1875-1958），國語學者、歷史學者、國文學者、國學者。出生於富山縣，富山中學肄業；取得中小學教師檢定，曾任職數間學校，而後擔任國語調查委員會補助委員。1924年後任職東北帝國大學講師、教授，1935年離職。1940年任職神宮皇學館大學校長；1944年擔任貴族院議員；1945年7月任國史編修院院長。因日本戰敗而遭解除公職；1958年獲頒文化勳章。其曾自創「山田文法」之文法體系，在《日本文

個問題。山田如是說，「擁有作為日本國籍者所使用的語言可謂各式各樣」，亦即，即便是日本國民，有使用愛奴語或朝鮮語，或使用「支那語系」的各種語族，所以他認為，「要讓所有日本國民所使用的語言都成為國語，並非簡單之事」。

很清楚地，上田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下所構想出的日本國民＝日本民族，而日本民族的語言為國語這個等式，已無法成立。

即便山田孝雄已意識到上田主張的等式已不適用於當時的日本，但他終究認為，「我們之所以認定國語，乃因其為日本帝國的中堅——大和民族表達思想與理解事物的重要工具，且自古以來即被使用，現今仍繼續言說，將來亦須以此發展。……一言以蔽之，即大日本帝國的標準語」，⁶³ 山田如此捍衛著此民族之語言的定義。而以下引用的山田之國語觀，其實也與明治時期的國語觀，無太大差異。

……國語乃每位國民所繼承其遠古祖先的精神性文化性之遺產。這與將遠古祖先的血液傳予後世子孫，而先祖亦擁有那血液，乃有著同樣的欣喜與感激之情；而國語具有可使後世子孫也能澎湃於心的力量，縱地來說是聯繫古今，橫地來說則是統合現今國民之心。⁶⁴

而曾於京城帝國大學講授國語學的上田萬年之弟子時枝誠記（1900-1967），⁶⁵ 於1942年也對上田的主張提出疑問：若如上田所

法論》、《敬語法の研究》、《漢文の訓読によりて伝へられたる語法》、《奈良朝文法史》等多冊國語學相關著作之外，亦出版各種古典作品的註釋等國文學相關著作；另亦有《国学の本義》、《大日本国体概論》、《校史》、《君が代の歴史》等多種國史學、文獻學、國學的著作成就。關於國語問題的著作，則有《国語尊重の根本義》、《国語政策の根本問題》、《国語の本質》等多冊；除了提倡國語與國體的關係密不可分，亦直接反對各時代的國語改革。

⁶³ 山田孝雄：〈国語とは何ぞや〉，收於朝日新聞社編：《国語文化講座：国語概論篇》，《国語文化講座》（東京：朝日新聞社，1941年），卷2，頁2。

⁶⁴ 山田孝雄：〈国語とは何ぞや〉，頁18。

⁶⁵ 時枝誠記（1900-1967），國語學者，東京神田人，1925年東京帝國大學

說，日語對日本人而言如精神性的血液，則對朝鮮人來說，其精神性的血液應為朝鮮語吧！然而，時枝從國語中發現國家式的價值，因此主張這個價值應該要在國語言說者，於自由意志下去選擇的。總之，國語的價值與日語的方言或朝鮮語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國語乃有其較優越的位置。⁶⁶ 甚且時枝認為，在朝鮮半島同時使用朝鮮語和日語教育，乃不幸之事，若朝鮮人能丟棄朝鮮語，而能樂於國語之中，則乃最大「福利」，因此他主張，語言政策應以讓朝鮮人在自由意志下願意選擇國語的方式來制定。⁶⁷

比起歷史面，此論述更強調了國語的制度面意涵，因此導出如此論述。於此，作為制度的國語，對於那些諸如朝鮮語等被排除的語言之考量，可謂不曾存在。

（三）從「日本語」到「東亞共通語」

在臺灣或朝鮮等日本殖民地，則一直都稱日語為「國語」。舉個象徵性的實例而言，即最早將「國語」列入初等教育的科目中的，就是成為殖民地的臺灣。而那終究是為使當地人成為帝國臣民而實行的國語教育，而非為了日語教育。即便在制度上亦有種種窒礙難行之處，為解決這些困境，則在文化上以帝國臣民之名加以統合殖民地人

國語國文學科畢業。曾任職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27-1943），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61年退休；而後轉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知名著作《國語學原論》（1941年）中提倡了語言乃主體表現過程之語言過程觀。時枝於朝鮮時所構思的著作《日本文法》，以口語篇（1950年）及文語篇（1954年）之姿問世。時枝亦關心國語教育，其語言過程論中談及的文法教育，在戰後的教育界中備受矚目。另著有《國語問題と國語教育》（1949年）等書。

⁶⁶ 時枝誠記：〈朝鮮に於ける国語政策及び国語教育の将来〉，《日本語》第2卷第8號（1942年8月）。

⁶⁷ 時枝誠記：〈朝鮮に於ける国語——実践及び研究の諸相〉，《国民文学》3卷1號（1943年1月）。詳細論述參考安田敏朗：《植民地のなかの「国語学」——時枝誠記と京城帝国大学をめぐる》（東京：三元社，1997年）。

民。因此，現今的日本語教育史中所用的「殖民地之日本語教育」一辭，事實上並不恰當。

殖民地帝國大學（京城、臺北）中，也設置了國語學講座；當然，也進行了國語相關研究。而是否要以國語教育的原理或技巧等理論為據，來正當化地普及國語等相關討論也是有的。

從這些事例可知，國語是以作為近代國家的統治手法而定義出來的。在民族國家內部持有效的普遍性之同時，亦存在著能否跨越國境的侷限性；亦即，與本國內的國語建置無關的殖民地之國語，須帶有不同的意義。也就是說，「國語裡賦有國民精神」的說法，是種讓人感受不到國語的強制與其暴力本質之手法，讓國語能輕易與「文化」、「傳統」加以連結，但這樣的邏輯卻無法在殖民地裡起作用。即便亦有朝鮮語和日語同語系的論述主張，但只要其與建構國語的現實無關，暴力就赤裸裸地顯露出來。就像學術上琉球語和日語也被證明同系，但實際上國語就是以毫不遮掩的暴力形式推動的，因此同語系的論述根本沒有任何效果。

而即便真有殖民地人民「自發性地同化」之案例，但國語在本質上卻已具備了「拒絕」殖民地人民的結構；亦即，無論國語學得再好，於此結構中，殖民地人民終究無法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但因為「同化」事實上是在所謂天皇「一視同仁」下被設定的目標，這種拒絕當然不能明說。而前述所言，將國語和方言之間加以曖昧化，讓方言言說者們自發性地內化之結構，幾乎於國語和殖民地的不同語言之間的關係。

也有不少主張認為，殖民地不同語言的言說者們必須學習國語，乃和日語的方言言說者必須學習國語一樣；而後，國語乃「文明」與「近代」的印象也被加以灌輸。甚至，1930年代後半以降，像把方言改換為標準語一樣地，將殖民地語言都換成國語之主張，也陸續登場。

而隨著國語內涵漸漸充實，在日清戰爭之後，國語作為東亞之共通語的論述也相繼出現。例如上田萬年於1895年時曾言：

難道僅是要致力於國語的「琢磨（ミガキアゲ）」，然後創造出通行日本全國的語言嗎？應是要有創造出讓與東洋學術政治商業等相關的人們，非為朝鮮人非為支那人，非為歐州人非為美國人，無論誰都必須理解，亦即可成為東洋全體之普通話的語言之決心才是。⁶⁸

上田的國語之概念，乃含有「東洋全體的普通話」=「大東亞共榮圈的共通語」這樣的定義範圍，而此內涵在後來的半世紀裡起了不小作用。⁶⁹

總之，隨著1930年代以降，日本從中國大陸展開侵略至東南亞各地，「日語」這個概念被加以實體化；此實體化的產生，乃因國語的理論在跨越國境之後有了侷限性。因此，要取得這跨越國境的能量，必須從不同於民族國家的理論得來，也就是去取得另外一種不同的普遍性。但問題在於，「日語」裡到底可承載多少超越民族國家的個別性，且其他共同體也能夠接受的「普遍性」呢？

當然，此「普遍性」的意義，亦是任隨「提供者」的解釋。而事實上，所謂「日語」中承載的「普遍性」之內涵，即諸如「文明化」、「東亞共通語」、「八紘一字」（按：天下一家）、「日本精神」等等，只是些自以為是的說法罷了。實施於「滿洲國」或軍政下的東南亞的，就是這樣的「日語」教育。也因此，日語教育亦被視為精神教育、禮儀教育的一環。

特別是1930年以降，學術界中開始出現國語之涵蓋範圍的討論，一方面在現實面，也因須回應「東亞共通語」的需要，乃至聚焦於現代語、口語之日本語學之名稱，漸漸地被廣泛使用；在此要指出的是，受時代背景的影響，諸如日本語教育為當時所需等論述，也漸漸被強調出來。總之，隨著帝國擴張，「日語」不能再是對內的封

⁶⁸ 上田萬年：〈國語研究に就て〉，《太陽》第1卷第1號（1895年1月），頁26-27；亦收錄於《國語のため》。

⁶⁹ 詳細論述參考安田敏朗：《帝国日本の言語編制》（橫濱：世織書房，1997年）。

閉定義，而須成爲一種「誰都可擁有」開放式語彙（「普遍性」）。然而，但即便有這樣的企圖與嘗試，普遍性仍沒有落實，終究它還是「誰才擁有」的語言。⁷⁰

與明治初期，擁抱「世界」＝西洋「文明」所開展的文字系統標記議論（表記論）等論述加以對比，則明治末期以降，爲了用體現「文明」的國語，將「文明」傳播至東亞「世界」，於是國語表記論、文體論等議論中產生了「日本語」這個新的概念，且被加以論述。⁷¹其中，爲了完成這作爲制度的「國語」，則需借助民族主義的力量，於是國語論、日本語論，或者國語政策論、語言政策論等等議論也慢慢地被牽引進來。雖然現行的假名使用或漢字字體，或者漢字限制等，乃是被加以制度化之產物，但對比戰敗後的日本民族主義空白期（或許對某些人而言是慌亂期而非空窗期），真可謂一大反差。⁷²

（四）殖民地之鏡

將作爲制度的國語移植至殖民地，當然與殖民地統治的問題有關。例如，1912年，持地六三郎於《台灣殖民政策》中曾有如下敘述。他認爲「欲使國語普及深植於當地居民的教育，應使其成爲首要的溝通語言」，且說明，「要看島民間是否有可作爲思想溝通媒介的標準語，因此與其採用文化落後的某一種土語作爲標準語，不如將文化上已發展的國語作爲標準語，不僅可便於島民間的溝通，也能方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溝通」。亦即，與其加以統整猶未統一且亦未達成「文化發展」的臺灣語言，不如採用已完成「文化發展」的國

⁷⁰ 關於日本語學問題，可參考安田敏朗：《日本語学は科学か——佐久間鼎とその時代》（東京：三元社，2004年）。

⁷¹ 詳細論述參考安田敏朗：《近代日本言語史再考——帝国化する「日本語」と「言語問題」》（東京：三元社，2000年），或安田敏朗：《日本語学は科学か——佐久間鼎とその時代》。

⁷² 詳細論述參考安田敏朗：《国語審議会——迷走の60年》（東京：講談社，2007年）。

語，且不僅只「島民間」，與日本人亦能溝通。這與森有禮在英語採用論中勾勒的藍圖相仿，但關鍵差異在於，持地將國語作為「同化手段」。持地又說，「要使土人的思想、風俗、習慣等和母國人一致，則普及國語乃是捷徑」。⁷³亦即，國語，非僅止於制度面向，它被賦予成擁有文化、文明的力量，而得以成為「同化」的重要媒介。雖然上田萬年將國語比喻成母親或故鄉，但將制度自然化的論述，究竟無法適用於殖民地，於是，替代母親或故鄉的文化、文明等論述，也就漸漸地浮上檯面。

持地在1900年至1910年之間曾任職臺灣總督府，對於以國語來將臺灣人同化成為日本人的藍圖應該很熟悉。然而，即便將國語加以制度化的企圖相當明確，但實際上，國語並非如此完美的語言。比方說，上田萬年曾從回到內地的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代理部長伊澤修二（1851-1917）聽來一些殖民地的消息，他於1897年如此敘述：

……（伊澤）說台灣人對聲調的分辯相當敏捷，反而內地人教師經常出錯，而為了他們閉口不言。這其實乃因他們已習慣四聲等聲調，逐漸就可調整，但反而卻是我們日本人對本國語言的研究草率為之，從而發生許多令人無法想像的蒙羞之情。⁷⁴

亦即，因為日本人教師的聲調並未循著規範來發聲，使得對聲調敏感的臺灣人的發音有所混亂，且對「本國語言的研究」草率為之而招致恥辱。而國語教育剛展開不久，即有如此不滿的聲音，也可充分證明同時期的內地之標準語，其實尚未成熟。雖然這裡只論及聲調問題，但像這樣的發言後來也越來越多，也就是說，規範還呈現相當不穩定的狀態。

而其後，作為標準的國語之整頓規範化工程，似乎也沒有這麼順

⁷³ 持地六三郎：《台灣殖民政策》（東京：富山房，1912年），頁295。

⁷⁴ 上田萬年：〈國語會議に就きて〉，《教育時論》第422號（1897年1月），頁25；亦收於《國語のため》。

利；或者可以說，它滲透到臺灣的，僅是其作為規範的國語這樣的主張罷了。終於1940年前後，為讓臺灣人說的日語能像日本人一樣，連像比手劃腳等方式的「會話一元」這種教育思想都出現了。⁷⁵

由此規範準則的觀點來看，臺灣人所言說的國語，可謂脫離規範的語言，但其實連教授兒童們國語的日本人教師的國語，也不是字正腔圓的。例如，靜岡縣出身的公學校教師川見駒太郎（1895-1982）即曾言，「向來，內地人都自認為自己的國語是正確的。……但可斷言自己的語法、發音（音質、音量）或聲調等等都是正確的日語者，到底有幾人呢？我認為告誡本島人『正因為是內地人，所以更要注意他的發音』的時期已經來臨」。⁷⁶聽起來相當諷刺，示範標準的一方再自我觀照一下，竟也察覺到標準並不存在一事。⁷⁷

五、代結語

本論文試著整理國語作為近代國家制度之一而出現，以及其如何被定義成自古即存在且幾近是理所當然不容懷疑的過程。於此過程中，殖民地等異地被納入版圖，而論述內涵也從「自然的樣子」（自然さ）轉換成「日本的樣子」（日本らしさ），進而強迫殖民地也日本化。殖民地的存在，本應成為反省虛構的「自然」（理所當然）之鏡，然實際上卻未發揮其功效。

本論文開頭引用的2004年出版的《これからの時代に求められる國語力について》（《關於能夠因應未來時代的國語能力》）之論述，即是此虛構的「自然」，至今仍持有影響力的例證，限於篇幅無

⁷⁵ 例如山崎陸雄：《二語併用地に於ける國語問題の解決》（臺北：新高堂，1939年）等著作。

⁷⁶ 川見駒太郎：〈台灣の國語はこれでよいか〉，《台灣地方行政》（臺北：台灣地方自治協會，1941年），頁29-30。

⁷⁷ 關於在臺灣被言說的日語之相關論述整理，可參考安田敏朗：《かれらの日本語——台灣「残留」日本語論》（京都：人文書院，2011年）。

法繼續說明，以下大致整理其輪廓，作為本論文之代結語。

日本戰敗後，以「民主主義國家」之姿重新出發，就制度而言，國語仍相當必要；甚且，殖民地已失去，顯然就不需再顧忌「日語是日本人的東西」這種說法，進而在與殖民地或沖繩分割之際，國語被重新加以建構。

即便是重新建構，卻也非將過去的國語面貌加以重整再解構。當然，也有企圖剷除國語表記法或文體中的封建餘燼之激進改革勢力；但國語中賦有「國民精神」的想法，卻依舊是共通的。簡單而言，論者們完全沒有懷疑明治以降被創造出的作為制度的國語之必要性，甚至連以批判角度去討論自然化的國語等議論，都是闕如的。

戰後，日本的國家體制得以保全，即天皇制得以繼續，則按此論理，國語也因此得到保全。若用國體所加持的天皇制仍舊存在的說法來看，國語即也是被加持的對象。⁷⁸ 若視國語為制度，則戰敗後的日本，基本上也是繼承之前的國家制度，因此，國語當然也受到保全。

不過，隨著1990年代後半勃發的民族國家批判之潮流，歷史學與教育學等學術領域，也開始著眼於近代日本在殖民地統治和帝國統治時所施行的語言政策，其中不乏針對將國語當作統治手法的一環，以及其排他性之相關研究。甚至也有「一個日語」的概念乃是近代之產物的相關討論。

但2000年以後，將「國語」和「日語」視為相對化概念而加以討論的風氣似乎弱化了，反而把「國語」和「日語」當成絕對概念而不容許批判的勢力漸漸強大了。這其實和「依循被建構的民族國家以及其歷史的論理，則只是落入圈套，我們應重新打造新的民族國家及其歷史的『主體性』」等論述的形成，頗有相似之處。

於上述的脈絡下，2004年的文化審議會報告裡也出現了國語觀，卻是極盡可能地忽視國語作為制度的面向，並不假思索地接納其自然

⁷⁸ 參見安田敏朗：《「国語」の近代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東京：中公新書，2006年）。

化的概念。

此報告，包括《国語とは祖国》及《国家の品格》等書的作者藤原正彥，以及《声に出して読みたい日本語》等書的作者齋藤孝等人參與其中。但，藤原等人在撰寫報告時，似乎沒有思考到作為制度的國語是經歷怎樣的歷史而自然化的相關問題，或者也沒有意識到以日語持續寫作的殖民地作家與那些被強迫學習國語（日語）的人們曾經存在的問題。或許可將這些論述視為，是對於近年日本境內的外國出身者人口比率漸增，而多語化現象也日益顯著的一種反動吧。然而，這些討論的出現，卻也顯示著對於近代國語的歷史省察有所不足。這樣的討論，或可視為國語觀彷彿退回至上田萬年的時代，但也或許，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延續現象吧！

談論這些也包含著自我反省，問題可能出自，1990年代以後的民族國家批判脈絡中之國語論，都著重在批判國語排他性的面向。站在被排除一方來檢視問題固然重要，但制度如何被自然化的論點卻更不能忽略。透過自然化，國語得到了收編力量；而自然化工程成功後，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自發性地接受國語的階層都會產生，因此，終究都是與「國語」這個體制的強化脫離不了關係。

而若要論及國語教育的強化，就必須批判地檢視作為統治手法而被強化的國語，且不能夠去歷史脈絡地來討論。

或許是因爲至今，語言、民族、國家等連結，被過度地視為理所當然了吧！正因如此，我想試著回到「個人」這個立場，來加以審思。

（責任編輯：曹庭瑄）

徵引書目

- 上田萬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に國語研究室を興すべき議〉，收於明治文化資料叢書刊行會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東京：風間書房，1975年，卷8。
- 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東京：富山房，1895年。
- 上田萬年：《國語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895年。
- 上田萬年：《普通教育の危機》，東京：富山房，1905年。
- 千種達夫：〈判決書の変遷とその思い出〉，《書齋の窓》第191號，1970年9月。
- 大久保利謙編：《森有礼全集》，東京：宣文堂，1972年。
- 大槻文彦：〈端書〉，文部省編：《口語法別記》，東京：國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1917年。
- 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發生の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
- 山田孝雄：〈国語とは何ぞや〉，收於朝日新聞社編：《国語文化講座：国語概論篇》，《国語文化講座》，東京：朝日新聞社，1941年。
- 山田萬年：〈國語學〉，《大妻國文》第7號，1976年3月。
- 山崎睦雄：《二語併用地に於ける國語問題の解決》，臺北：新高堂，1939年。
- 川見駒太郎：〈台灣の國語はこれでよいか〉，《台灣地方行政》，臺北：台灣地方自治協會，1941年。
- 文化審議會：《これからの時代に求められる国語力について》，文部科學省，網址：<http://www.mext.go.jp/b-menu/shingi/bunka/toushin/04020301.htm>，檢索日期：2012年10月25日。
- 文化廳編：《国語施策百年史》，東京：文化廳，2005年。
- 平井昌夫：《國語國字問題の歴史》，東京：昭森社，1948年。
- 甲斐雄一郎：《国語科の成立》，東京：東洋館，2008年。

- 矢田部良吉：〈羅馬字ヲ以テ日本語ヲ綴ルノ説〉，《東洋學藝雜誌》第7、8號，1882年4、5月。
- 立柄教俊：《小學校令準據實用教授法》，東京：目黒書店，1901年。
- 安田敏朗：《帝国日本の言語編制》，横濱：世織書房，1997年。
- 安田敏朗：《植民地のなかの「国語学」——時枝誠記と京城帝国大学をめぐる》，東京：三元社，1997年。
- 安田敏朗：《〈国語〉と〈方言〉のあいだ——言語構築の政治学》，京都：人文書院，1999年5月。
- 安田敏朗：《日本語学は科学か——佐久間鼎とその時代》，東京：三元社，2004年。
- 安田敏朗：《「国語」の近代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東京：中公新書，2006年。
- 安田敏朗：《国語審議会——迷走の60年》，東京：講談社，2007年。
- 安田敏朗：《かれらの日本語——台湾「残留」日本語論》，京都：人文書院，2011年。
- 西 周：〈洋字を以て國語を書するの論〉，《明六雜誌》第1號，1873年4月。
- 物集高見：《言文一致》，東京：十一堂，1886年。
- 芳賀矢一、杉谷代水編，益地憲一校訂：《作文講話及び文範》，東京：講談社，1993年。
- 長谷川精一：《森有礼における国民的主体の創出》，京都：思文閣，2007年。
- 保科孝一：《國語教授法指針》，東京：寶永館，1901年。
- 持地六三郎：《台湾殖民政策》，東京：富山房，1912年。
- 神田孝平：〈文章論ヲ讀ム〉，《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7編第1冊，1885年2月25日。
- 渡辺裕：《歌う国民——唱歌、校歌、うたごえ》，東京：中公新書，2010年。

-
- 滑川道夫：《日本作文綴方教育史》，東京：国土社，1977年。
- 廣瀬續：〈國語普及新段階〉，《朝鮮》第329號，1942年10月。
- 稻富榮次郎：〈明治初期國語廢止論（上）〉，《國語文化》第3卷第7號，1943年7月。
- 橋本治：《言文一致体の誕生——失われた近代を求めてI》，東京：朝日新聞，2010年。
- Baba, Tatui. *An Elementary Grammar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London: TRÜBNER AND CO., 57 & 59 LUDGATE HILL, 1873.